

【思想文化研究】

拯弊与集权: 唐五代覆试及其与宋初殿试的关系

薛亚军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杭州 310027)

**摘要:** 唐五代覆试与当时的科场风波密切相关, 其或因朝臣党争而起, 或因知贡举者失和于权贵而行, 长庆以后的子弟问题在历次覆试案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覆试内容与省试相同, 进士试诗赋杂文, 明经帖经墨义。初试及第者覆试中普遍有所刷落, 主文试后也会受到外放惩处。唐五代之覆试与中书门下的考覆分别在形制、权力两方面影响了宋代殿试的产生。宋太祖、太宗之世, 作为唐五代科举考试拯弊补救措施的覆试, 不仅本身扩大范围而制度化, 其中又且衍生出宋代集权表征之一的科考最高形式——殿试。“覆试”、“考覆”及今日之“复试”三概念不同。

**关键词:** 覆试; 考覆; 唐五代; 殿试; 请托

**中图分类号:** G42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2)02-0005-05

On Abolishing what is Harmful and Centralization of Statepower  
the Relation between Fushi of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nd Palace Examination of Song Dynasty

XUE Ya-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Fushi (re-examination of palace examination participant in controversy) is closely related to palace examination incidents, resulting from either the minister party struggle o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chief examiner. The petticoat influenc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ushi after the era of Changqing. The content of fushi is usually the same to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 but the general result is to eliminate some examiners in controversy, while the chief examiner will be punished. The Fushi and Kaofu (re-judgement of papers in controversy), under charge of Zhongshumen (the minister in charge of palace-paper-drafting),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owership and system of Song Dynasty Palace Examination. The concept of Fushi and Kaofu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resent re-examination.

**Key words** Fushi; Kaofu; Tang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Palace Examination; petticoat entrust

覆试是指对全体或部分及第士子重新进行考校的考试, 又称重试。其肇始于初唐, 频仍于唐末五代, 与科举制度草创时期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唐五代的覆试主要集中于唐高宗之世与唐末五代两个时段, 高宗朝覆试与唐初诗赋取士制度的正在形成及“进士特难其选”(《唐语林》卷八)之时势相关, 晚唐五代

的覆试则既关乎时乱世衰、科场黑暗之历史背景, 同时又孕育着宋初殿试的萌芽。下面就唐五代覆试的背景、动因、内容、范围及其至宋初殿试的演变过程作一论述。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 盛于贞观、永徽之际; 缙绅虽位极人臣, 不由进士者, 终不为美, 以至岁贡常

收稿日期: 2002-02-16

作者简介: 薛亚军, (1968-) 男, 陕西韩城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主要从事隋唐五代文学与史学研究。

不减八、九百人”(《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有唐一代科举诸科中,进士一门尤为时所尚,及第的艰难与仕进的快捷使此科成为改变个人、家族命运的重要砝码。中唐以后,随着世家大族的进一步衰落,安史乱后新贵的次第崛起,进士出身者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进士擢第更显示出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士族希望藉此挽回其昔日的特权地位,重温其逝去的至尊荣光;新贵打算以之维系其列位清显的政治优势;战乱社会背景下的庶寒一族,在谋生动机远胜于报国情怀的心理驱动下,10年、20年甚至30年奔竞科场,企冀进士一第能带来时运的彻底转机。于是科场内外,举子煽为朋党,横行请托,官员勾心斗角,荐引成风,兼以长庆(821—824)之后子弟问题的提出、朋党之争的卷入,使得科场特别是进士科考成为竞争激烈、矛盾复杂的变相政治争斗。所谓“当开元、天宝之世,始专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近日已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肩之日;会非考核,尽系经营”(《唐摭言》卷二《废等第》)。“唐时举进士,自状头以下,皆以势力游扬得之。以摩诘之才,不难作梨园子弟以干公主。及其末也,裴思谦紫衣怀阉竖之刺,求状元及第,而试官不敢违。奔竞之风,于斯极矣”(《五杂俎》卷一四)。“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等均反映了唐代科场黑暗之情实。

唐宣宗即位后对科举制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虽则推动了科举制度化的进程,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宣宗朝科场风气之坏达到高潮。刘宁《论唐末科场黑暗之根源》(《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4期)、侯力《关于晚唐科举制度的几个问题》(《浙江学刊》1998年4期)、赵守俨《唐代的科场风波》(《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8月版)于此皆有论述,此不赘。

覆试即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

唐五代覆试多为进士科,此外也波及到制科、明经及吏部宏辞等。《旧唐书》卷一八八《孝友传》载:“(崔沔)初应制举,对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则天令所司重试,沔所对策,又工于前,为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此天册万岁二年(696)制举重试策文之事;《册府元龟》卷六四四:“(大和)三年三月……敕:郑齐之、李景素,据所试比较尝(常)例得者,不甚过差,宜并与及第。明经王淑等五人,覆试帖义通数高,并与及第。”是则别头所试明经、进士参加覆试者;《南部新书·戊》:“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昌

暗,科场当有事。’沈询为礼部,甚惧焉。至是三科尽覆试,宏词赵<sub>和</sub>等皆落,吏部裴谔除祭酒”(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按:“三科,谓进士、明经、宏词。”所载吏部宏词科亦因故覆试。

覆试的根本原因是科场污浊不正的风气,具体缘由则各有不同。其中因朝臣党争所引发的长庆元年覆试案对唐代政治进程与科举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双重影响。

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放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榜下之后,物议纷纷,竟然惊动了穆宗皇帝,于是“二月十七日放榜,三月二十三日重试,落第十人,徽贬刺史”(《唐摭言》卷九)。事情经过,《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徽传》叙述颇详,录如下:

长庆元年,(徽)为礼部侍郎。时宰相段文昌出镇蜀川,文昌好学,尤喜图书古画。故刑部侍郎杨凭兄弟以文学知名,家多书画,钟、王、张、郑之迹在《书断》《画品》者,兼而有之。凭子浑求进,尽以家藏书画献文昌,求致进士第。文昌将发,面托钱徽,继以私书保荐。翰林学士李绅亦托举子周汉宾于徽。及榜出,浑之、汉宾皆不中选。李宗闵与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遣逐久之,及得还朝,大改前志,由是以徽进达,宗闵亦急于进取,二人遂有嫌隙。杨汝士与徽有旧,是岁宗闵子婿苏巢及汝士季弟殷士及第。故文昌、李绅大怒。文昌赴镇,辞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进士郑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穆宗以其事访于学士元稹、李绅,二人对与文昌同。遂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于子亭重试……诏曰:“……孔温业、赵存约、窦洵直所试粗通,与及第;裴<sub>翼</sub>特赐及等,郑朗等十人并落下。自今后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讫,所试杂文并策,送中书门下详覆。”

收取杨家贿赂的宰相段文昌所荐之杨浑之、翰林学士李绅所荐之周汉宾均未及第,而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与钱徽有旧的右补阙杨汝士之弟杨殷士及郑朗、户公亮等公卿大臣子弟却列名榜中。于是,一场借“子弟艺薄不当在选中”为口实以泄请托未果私愤的朝臣派系之争揭开了唐代后期迁延穆、敬、文、武、宣五朝,历时近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的序幕,同时,也使科举考试中的子弟问题浮出水面。

此覆试案中,段文昌、李绅、元稹、李德裕为弹劾有司试士不公一方,钱徽、杨汝士、李宗闵为涉嫌请托的被劾一方。李绅与段文昌因所荐之人未第遂首发弹劾钱徽等人,元稹因多种原因也站到了段、李一边。首先元稹与李绅是文友、诗侣,李绅元和初作

《乐府新题》诗二十首,元稹作《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率先唱和,二人文学上可谓志趣相投。此外贞元年间李绅曾依投元稹岳父时任苏州刺史的韦夏卿门馆,因而元李兼有旧情(参卞孝萱先生《李绅年谱》,《安徽史学》1960年3期),所以长庆元年覆试案时元稹支持李绅。其二,段文昌于元稹有恩。元氏元和十五年(820)五月得迁祠部员外郎知制诰,赐绯鱼袋得力于当时宰相段文昌的推荐。元稹《文稿自叙》言:“穆宗初,补相更相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中。上然之,不十数日,次用为给舍”(《全唐文》卷六五三)。元稹后来之变革诏书体格也得到了段文昌的理解支持。至于长庆元年二月元稹除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也多与段氏有关(参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6月版)。总此三事,段文昌对元稹有知遇之恩,故穆宗访钱徽滥放子弟事于元稹时,其口径与段文昌一致。其三,元稹、李德裕系同事,同时供奉翰林,二人与李绅有翰林院“三俊”之美誉,复以元稹与李宗闵交恶(见上引《钱徽传》),李德裕和李宗闵乃世仇(见下),所以元稹、李德裕同仇敌忾,联手奏钱徽私受大臣请托所试非公。

李德裕在长庆元年科场风波中支持段文昌与李绅,除了其与李绅融洽无比的同事关系而外,主要原因是他和李宗闵的积怨。元和三年(808)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等考制科举人,擢李宗闵、皇甫湜、牛僧孺等及第,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因李宗闵等人对策中指陈时政弊端措辞激烈,乃泣诉于宪宗皇帝,出李、皇甫、牛三人为关外官(《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由此二李结怨,埋下祸根。长庆元年李宗闵等有请托嫌疑,李德裕便抓住时机“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以致钱徽贬江州刺史、李宗闵贬剑州刺史、杨汝士贬开江令。

长庆元年覆试案是元和三年制举科场案矛盾的继续与表面化,又是朋党形成的标志。

此因朝臣党争而覆试者。

乾宁二年(895),颇为寒微开路的唐昭宗或鉴于其前党争影响科举公正的教训,挑选了“百行有常,中立无党,学窥典奥,文瞻菁英”(《莆阳黄御史集》)附《昭宗实录》的崔凝知贡举,但榜放之后,舆论哗然一片,昭宗只好下令翰林学士陆贽于内殿覆试,结果及第十五人,覆落十人,此次覆试的具体原因诸书记载不一:《唐才子传》卷十、《莆阳黄御史集》附录《唐昭

宗实录》《吴越备史》《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分别言“物议纷纷”、“及览成文,颇多芜累”、“渝滥尤众”、“物论以为滥”,归之于滥放所引起的舆论不满。《旧五代史》卷六《苏循传》却说:

初,循子楷,乾宁二年登进士第,中使有奏御者云:“今年进士二十余人,侥幸者半,物论以为不可。”昭宗命学士陆贽、冯渥重试于云韶殿,及格者一十四人。诏云:“苏楷、卢贻等四人,诗句最卑,芜累颇甚,曾无学业,敢窃科名,浼我至公,难以滥进,宜付所司落下,不得再赴举场。”

所载及格人数与“卢贻等四人诗句最卑”语,与《册府元龟》所录不尽一致。尤可注意者在“中使有奏御者”一句,盖中使某人在此科场案中起了重要作用,覆试或因中使之奏而行。又,《唐摭言》卷十四:“乾宁二年,崔凝榜放,贬合州刺史。先是李滚附于中贵,既愤退黜,百计摧之,上亦深器滚文学,因之蕴怒,密旨令内人于门搜索怀挟,至于巾屦,靡有不至。”是知崔凝因黜退李滚而得罪了中贵人及昭宗皇帝,故昭宗派人至考场寻事找碴,伺机报复。综合上引两条记载推测,乾宁二年覆试恐乃昭宗“蕴怒”与中使进谗言二者化合的产物,所谓“及览成文,颇多芜累”等语只是敕书中的堂皇借口而已。再者,《唐摭言》卷七载:“昭宗皇帝颇为寒微开路。崔合州(凝)榜放,但是子弟,无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间屈人不少。”这样,该年覆试又与长庆以来进士科举中争论不休的子弟问题有关。

此因知贡举者与皇帝、中使关系不和而招致覆试者。

其他覆试尚有“物论以为请托”(会昌五年)、“主司漏泄题目”(大中九年)、“尚干浮议”(同光三年)等方面的原因。

高宗咸亨五年(674)、开耀二年(682)、嗣圣元年(684)共覆试三次,中宗神龙元年(705)重试一次,因史料缺乏,其覆(重)试原因及具体情形均不得而知。

唐五代覆试的内容,进士为诗赋。如同光三年(925)卢质于翰林院覆试符蒙等四人,以《君从谏则圣赋》《臣事君以忠诗》为题;长庆元年覆试《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乾宁二年覆试《曲直不相入赋》《良弓献问赋》《询于刍荛诗》《品物咸熙诗》,二赋二诗,较特别。唐五代覆试诗赋题多不存,作品留传至今者更少。从《文苑英华》卷一八五所录赵存约、窦洵直、孔温业等人三首《鸟散余花落》诗看,诗均五言六韵,题中用韵(窦押“余”字,孔、赵押“花”字),形制与省试诗相同。同光三年《君以谏则圣赋》

要求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与进士试律赋用八字韵脚亦一致。现存乾宁二年黄滔参加覆试的《曲直不相入赋》《良弓献问赋》,前者仅限押“曲直”二字,后者以“太宗问工人:木心不正,脉理皆斜,若何道理”取五声依轮次,以双周隔句为韵,限三百二十字成,殊属特例。该年覆试二诗,《询于刍蕘诗》要求做回纹诗,正以“刍”倒以“蕘”为韵,《品物咸熙诗》要求七言八韵成,亦颇怪异。

明经科覆试内容,据《册府元龟》卷六四“(大和三年)明经王淑等五人,覆试帖义通数高,并与及第”语,与初试之贴经、墨义相同。

唐、五代进士明经二科覆试无时务策要求,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进士及第决定于杂文(诗赋),明经及第取决于帖义的事实。

一般来讲,覆试及第进士由翰林学士担任主考官,或有其他官员协同考校者。唐五代翰林学士多由当世文坛巨公担任,据《旧五代史》卷九二《李恠传》:“(中书门下)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下礼部,为举人格样。”唯翰林学士方有撰写诗赋标本的资格及荣耀,由其主持覆试比较合适。会昌五年白敏中、乾宁二年陆贽、同光三年卢质等皆以翰林学士身分主持覆试。长庆元年覆试,因翰林学士李绅、元稹、李德裕均附和段文昌,穆宗皇帝破例以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为覆试官员以防舞弊偏袒。

唐五代覆试诗赋试题多由主持官员拟定,如同光三年所试即主考翰林学士命题,偶有如长庆元年、乾宁二年皇帝亲自为覆试命题者,当非常例。

覆试地点或在宫廷之中(乾宁二年),或在翰林院里(同光三年、会昌五年),或于其他地方,如长庆元年覆试于子亭。此外尚有覆试时考与试分两处进行的情况,乾宁二年于武德殿东廊重试及第进士,复于云韶殿内考校诗赋(相当于今日之阅卷)。

在为数不多有较详历史记载的覆试中,穆宗长庆元年的覆试对象比较特别。一般情形下,参加覆试者为该年某科所有初试及第士子,但长庆元年诏令参加覆试者仅为有请托嫌疑的郑朗、卢公亮、杨殷士、苏巢等官僚子弟十四人(参《册府元龟》卷六四〇《唐会要》卷七六、《唐摭言》卷十四、《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徽传》、《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等),而该年钱徽所放进士为三十三人(见《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二》)。天成四年(929)中书门下条流贡举人事件第三条:“有依托朝臣者,于解里具言在某官姓名门馆,考试及第后,并据姓名覆试”(《五代会要》卷二三),所指亦为部分及第者范围内的覆试。

覆试的结果对举子来讲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重试及第者,大喜过望;被黜落者,怨恨怅恨。乾宁二年蹉跎举场二纪之久的诗人黄滔初试擢第,但中举的短暂快乐随着覆试敕下而随风荡尽。好在老天见怜,五十六岁的黄滔覆试中未被刷落,《御试二首》《成名后呈同年》等诗作反映了黄滔重试及第的欣悦情态及友人相贺之情景。《黄御史集》卷四《附来赠诗》二首,其一为褚载所作《贺黄文江覆试及第》(《全唐诗》卷六九四作《贺赵观文重试及第》),诗曰:

一枝芳桂两回春,始验文章可致身。

已把色丝邀上第,又将鸿笔冠群伦。

龙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烧转觉新。

今日街头看御榜,大能荣耀苦心人。

重试落第者的心情则较及第者更为复杂:几日前金榜题名的喜气尚未从脸面褪去,曲江宴饮的欢会指日即至,而覆试及落选的打击却接踵而来,何况有时这一造化弄人的遭遇恰落在初试状元身上。长庆元年初试状元郑朗“初举,遇一僧,善气色,谓公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其所卜”(《唐摭言》卷七)。由“贺客盈门”到“唁者甚众”,由他人企羡的状元降为朋友的同情对象,其间的酸甜苦辣想必日后拜相的郑朗忆及仍该泫然涕下的吧。

乾宁二年覆试落第者苏楷、崔砺、杜承昭、郑稼等四人不仅失去了已得之进士头衔,而且敕书中明言四人“不令再举”,断送了其进士出身之路。故此,负愧衔怨十年之久的苏楷于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同起居郎罗衮、起居舍人卢鼎连署驳昭宗谥号以图报复(见《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史载楷“目不知书,手仅能执”,其驳昭宗谥号文竟亦为罗衮代庖,足见其遭黜落不算冤枉。

参加同光三年覆试之符蒙等四人比较幸运,或以皇帝顾怜参试者寥寥(《册府元龟》卷六四四言仅数十人参加考试),中试者又仅符蒙等四人,或以四人确有真才实学,该年重试竟无刷落,惟四人等第略有调整:初试前二人符蒙、成僚改为三、四名,初试第三、四名王彻、桑维翰列名一、二。

覆试的结束意味着知贡举者处分的来临。唐五代处置取士不公之知贡举者,方法均为外放,钱徽贬江州刺史(长庆元年)、崔凝贬合州刺史(乾宁二年)等是也。同光三年因覆试未有落下者,故礼部侍郎裴君谟得以“特议宽容”、免于处分(见《册府元龟》卷六四

## 四).

唐五代覆试与长庆以后中书门下的考覆随着覆试频度的增加及中书门下考覆的渐趋制度化,到了宋代便结合衍化成一种新的科考形式——殿试。

殿试之名出自载初元年武则天策贡士于洛城殿(《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唐纪》二十),其实则出于唐五代的覆试与考覆。

宋开宝元年(968)诏食禄之家有亲戚应举者“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今覆试”,开宝五年(972)太祖皇帝召对及第者于讲武殿,此殿试之渐;开宝六年(973)覆试李昉下及第进士、诸科人,殿试遂成为制度固定下来。权力上讲,宋殿试使选才最终决定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它是初唐举士由吏部员外郎、开元二十四年后知贡举由礼部侍郎、长庆以后取士多受制于中书门下这样权力逐渐上移的必然结果。殿试出现于宋太祖之世,亦与其时政治、军事、文化上一系列集权措施相对应。形式上讲,宋初殿试即唐五代覆试的延续,即其称谓宋初亦为“覆试”而非“殿试”(见《宋书》卷一五五《选举一》开宝六年条、太平兴国二年条等)。

殿试制度的完善是在雍熙二年(985),该年宋太宗定殿前唱名、皇帝亲赐及第之制,进士直接成为天子门生,从而使士子及第“恩出天子”而革“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之故习(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如此,既提高了及第者的身价可收笼络人心之效,又有防止科场舞弊之实际功用,同时还希望借此达到遏止朝臣结党营私、士子座主结成门生座主关系的长远政治目的。

雍熙以后皇帝主持的覆试成为比礼部试更高一级的制度性考试,被称作殿试或廷试,而此制度性覆试宋太宗以后又从朝廷下移横扩至“乡贡、监补、省试皆有覆试”(《宋书》卷一五五)的程度以防滥名充贡者。宋制度性覆试出于唐五代覆试,但其性质则与现今的复试略同。虽然如此,唐五代意义上的覆试仍在宋元明清各朝科场案中继续存在。如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顺治帝亲自于太和门覆试两百名顺天乡试新科举人,革去文理不通者八人(此事因上年顺天府乡试贿卖关节案而起,见《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三》)。且将唐五代覆试分化演变示于图 1:

最后谈谈唐五代覆试与考覆的关系及其与今日复试的区别

会昌四年(844)知贡举王起续奏子弟五人,后“恩旨令送所试杂文,付翰林重考覆”,仅放杨严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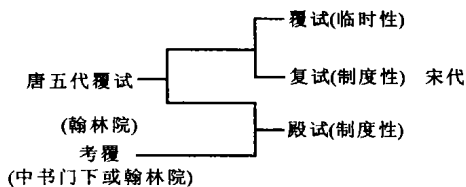


图 1 唐五代覆试分化演变图

及第(《唐摭言》卷八);天成五年(930)进士及第十五人,“敕新及第进士所试新文,委中书门下细览详覆”(《册府元龟》卷六四二),落下九人;显德二年(955)放进士十六人,“周世宗申命近官,再加考覆”(《杨亿集·杨徽之行状》),落十二人。此几例所言“考覆”、“详覆”皆指对及等进士的初试杂文试卷重加评阅审定而非重新命题以试及第者的覆试之比。

考覆之制,“开元中,礼部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其后中废”(《新唐书》卷三四《选举志》上),盖礼部试士伊始(开元二十五年)即行此制,后废弃,取士一主于礼部。长庆三年礼部侍郎王起奏:“本司考试讫,其诗赋先送中书门下详覆,候敕却下本司,然后准旧例大字放榜”(《唐会要》卷七六)从之,中书门下考覆遂为定制。其后虽尚有争议,却少例外。可见考覆仅为对及第者试卷的审查检验,与覆试及省试之别种不同。

覆试与今日复试概念又不同。今所谓复试是制度化地对初试合格者进行深入考察的考试方法,其中有等额,也有差额,多以优中取优为宗旨,而唐五代覆试则是非制度化临时对及第者重新考试以防滥收乱放的措施,它多与科场舞弊相关,因此唐五代覆试又被称作重试。今日之复试则不能称为重试。

至于大和三年及贞元十三年两次考试是否有过覆试,因史书记载足舛驳,难以遽下断语,存以俟考。

## 参考文献:

- [1] [宋]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 [2]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清]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7] [宋]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8]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